

● 世界历史

德法关系的历史发展与欧洲联合^{*}

邢 来 顺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邢来顺(1963-),男,安徽当涂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欧洲史、德国史研究。

[摘 要] 德法两国间从中世纪开始的频繁战争,给两国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从近代以来,人们开始探索通过欧洲联合的途径化解法德之间的仇怨。20世纪 50年代上半期,德法两国终于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下走向和解。德法和解是推动欧洲联合的主要因素。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则是德法两国取得和解的惟一可选择道路。

[关键词] 德法关系;德法和解;欧洲的联合

[中图分类号] K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203-08

德国和法国是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然而,自中世纪以来,这两个国家就像命中注定的冤家,在欧洲演绎着相互仇杀的历史,并不断地将周边国家卷入战火之中。频繁战争不仅使德法两国人民长期承受着家破人亡的苦难,而且也使欧洲经常处于动荡之中,欧洲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于是,实现德法两国的和解,实现欧洲和平和合作就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目标。

—

公元 843 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签订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其中,由勃艮第、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等部分构成的中部王国由于自北而南民族成份复杂,无法形成牢固的国家基础,不久便分裂瓦解,倒是只有罗曼语族构成的西法兰克王国和由日耳曼民族构成的东法兰克王国成了日后法兰西民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此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争夺疆土和称霸欧洲大陆,不断进行战争。法德关系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焦点。

公元 911 年,加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路德维希死后无嗣,各部落公爵推举法兰克公爵康拉德为国王,开始了德意志国家的历史^{① [1](P. 38)[2](P. 16)[3](第 69 页)},从此也开始了德法两个国家之间的不断纷争。仅在年轻的德意志国家出现后的头 15 年,前两任国王康拉德和萨克森的亨利一世就与西法兰克王国为争夺洛林和阿尔萨斯展开了数次战争。

公元 936 年,奥托一世继位,德国国势强盛,他不仅大举向外扩张,而且于公元 962 年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俨然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然而,王权选举制和封建领主的巨大独立性等使德国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对建立强大中央政权不利的因素。1356 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在选侯们的压力下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认选帝侯们选举皇帝的权利,并承认诸侯在自己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从此,德

^{*} 收稿日期: 2001-09-15
基金项目: 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2673137/00)

国诸侯们不断与皇帝分庭抗礼,以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这就给周边国家干涉德国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西邻法国从地缘政治出发,将保持德国的分裂软弱状态和促使其衰微当做自己的目标^[4](第 100 页),不断染指德国事务。而奥托一世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也使得德意志民族在潜意识中埋下了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在日后带着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断向外扩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德国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德法两国的冲突从中世纪以来一直不断,而且愈演愈烈,战火燃及欧洲其他国家。

1519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登上德国皇位。他决心通过打击新教诸侯分裂势力来加强中央集权。法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它不顾自己是天主教国家,支持德国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帝查理五世对抗。结果,法王弗兰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在 1521—1544 年间进行了四次战争,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纷纷卷入。尽管战争以法国的失败告终,但这些战争使得查理五世无法集中精力于国内,从而使德国境内的诸侯们有充分的时间巩固自己的独立地位。1552 年,法王亨利二世又趁查理五世与诸侯们斗争时侵入洛林并占领麦茨、图尔和凡尔登等城市。此后,削弱德国,并不失时机地割占它的领土一直是法国的“基本路线”^[5](第 326 页)。德国则因其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与法国的斗争中长期处于不利的境地。

1618—1648 年 30 年战争期间,法国再次成了支持德国分裂势力与皇权对抗的外国势力总后台。它不但怂恿丹麦、瑞典出兵反对德国皇权,而且通过自己在关键时刻参加战争而决定性地击败了哈布斯堡王朝。结果,在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法国成了最大的受惠者。它从德国得到了阿尔萨斯大部,1552 年占领的麦茨、图尔、凡尔登和洛林地区也得到确认。削弱德国的目的也得到实现:荷兰、瑞士正式从德国独立出来;瑞典得到了德国北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德国诸侯们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法国和瑞典等有权参加德意志的帝国议会。所有这些,不仅使德国的边界缩小,而且大大削弱了德国的皇权和国家力量。

进入 18 世纪后,德意志出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强相争的格局。法国转而利用普奥之间的矛盾,不断帮助较弱的一方打击较强的一方,结果使普奥之间的每一次战争几乎都发展为欧洲多国间的国际性战争。1740—1748 年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法国就站在普鲁士一边打击力量较强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把它当做“最后解决哈布斯堡王朝的千载难逢的良机”^[6](第 236 页),结果使奥地利失去了西里西亚和在意大利的部分属地。此后,由于普鲁士的迅速壮大,法国又转而支持奥地利,并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期间站在奥地利一边打击普鲁士。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德冲突依然不断。法国大革命初期,奥地利和普鲁士充当国际封建势力镇压法国革命的急先锋,要帮助法王路易十六恢复政权,并派兵侵入法国。此后,在英国组织的七次反法联盟中,都有德意志邦国参加。其中,普鲁士参加了第一、四、六、七次反法联盟,奥地利参加了第一、二、三、五、六、七次反法联盟。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军不仅屡败德意志的普奥两大邦国,而且迫使奥皇弗兰茨二世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最终给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划上了句号。

法军的胜利一方面展示出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向法国学习,锐意改革德意志的政治结构^[7](P. 31),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民族国家而努力。1848 年革命后,通过改革逐渐强大起来的普鲁士担当起了统一德国的历史重任。然而,这时的法国再次成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绊脚石。1866 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为防止普鲁士进一步统一南德四邦,进而统一德国,法国立即出面阻止。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8](第 91 页)。1870 年,双方再次兵戎相见。结果,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正义事业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阻碍,战争中惨败的法国却被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赔款 50 亿法郎。普王威廉一世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凡尔赛镜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

1870 年战争并没有结束德法间的恩怨。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割取阿尔萨斯—洛林只是将被法国人抢走的东西重新夺了回来,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阿尔萨斯—洛林虽然是法国抢占的德国土地,但数个世纪的岁月已经使那里的民法兰西化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已“觉得自己是法国人”^[4](第 214 页)。于是,

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就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也因此埋下了未来法德纷争的种子,成了两国关系中“溃烂的炎症”^[9](P. 78)。当时,恩格斯就曾预言:“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10](第 437 页)^[11](第 510 页)。从德国方面看,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霸主。与往日强大的法国曾不断地欺压分裂软弱的德国一样,德意志帝国也依仗自己的军事优势不断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两国间因此战争危机不断,并形成了以各自为核心的军事集团。双方不断为下一次战争扩军备战。

1914 年,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别作为两大军事集团核心成员的德国和法国成了这场战争主要承担者。战争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1918 年 11 月 11 日,当德国代表在巴黎东北贡比涅森林联军司令福煦的列车上投降时,法国终于获得了洗雪 1870 年之耻的机会。在签订和约的过程中,被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克雷蒙梭向德国代表团递交了事先拟就的条约文本,并傲慢地宣布:“清算的时刻到了,……我们一定会一致决心采取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得到一切我们理应得到的满足。”结果,根据 1919 年苛刻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不仅丧失了一切海外属地和帝国 1/8 的领土,还要赔偿大批的货物和现金。这就使德国人和 1870 年时的法国人一样,在内心种下了复仇的种子,从而为日后德法之间的再一次仇杀埋下了伏笔。

1939 年,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 年 6 月,德军横扫法国北部,迫使法国贝当政府投降。这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惊人相似的一幕又一次出现在贡比涅森林的列车上。希特勒特意安排在这里接受法国的投降签字,以为报复。法兰西和德意志两个民族就这样冤冤相报,无休止地相互厮杀着。

二

法德两国之间无休止的战争不仅使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使整个西欧因兵燹而元气大伤,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更使作为主战场的西欧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频繁战争必然引起人们对和平和安宁的向往。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理性地处理包括德法两国在内的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即用战争以外的途径来解决欧洲各国间的分歧,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使欧洲出现一种和谐的局面。于是,从近代以来,欧洲出现了一些鼓吹通过欧洲联合来化解分歧,求得和平的观点和理论。在这方面也以战争受害最深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最积极。

有关欧洲联合的想法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法国的圣-皮埃尔被称为欧洲联合的精神“鼻祖”^[12](第 45 页)。他在所著《永恒和平方案》中首先提出了永恒和平和欧洲邦联政府等相互联系的思想,即通过建立各国参加的欧洲“邦联政府”来实现欧洲各民族间的“永恒和普遍的和平”。1795 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永恒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世界联邦实现永恒和平的设想。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种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要求“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以便“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13](第 207 页)。因此,进入 19 世纪后,欧洲联合的想法进一步发展成为“欧洲统一”的观念。在 19 世纪 40 年代,法国就涌现出了一批欧洲联邦主义者。著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即是其中的代表。他提出了欧洲应由大小不一的“联邦”组成,然后联邦与联邦之间再结成更大的“欧洲联邦”的构想,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欧洲战争。他甚至作出了欧洲联邦开始于 20 世纪的预言^[12](第 126 页)。此外,这一时期的法国人还提出了“欧洲合众国”、“欧洲联盟”等主张和思想。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则提出了建立“欧洲共和国联邦”的想法。

实现欧洲联合,根本的目的在于实现欧洲的和平,使欧洲各国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稳定发展。因此,人们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欧洲的联合问题,而且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布鲁塞尔、巴黎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地曾多次举行和平大会,要求欧洲国家为和平联合起来。1891 年的罗马国际和平大会决议中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问题。20 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战争的迫近,要求建立欧洲合作以避免战争的呼声更是日益高涨。英籍德国实业家马科斯·瓦希特提出了建立以英德两国为

核心的欧洲体系的设想,并发起召开了 1909 年的罗马“欧洲联邦”大会。1914 年,他又在伦敦建立了“欧洲统一联盟”,旨在通过经济合作使欧洲各国求同存异,以共同利益为“欧洲联邦”奠定基础^[12](第 186 页)。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所走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欧洲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通过欧洲联合消除战争恶魔。一位挪威生物学家指出:“在所有欧洲国家在欧洲合众共和国旗帜下联合起来以前,欧洲的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12](第 189-190 页)战争中受害最深的德法两国人民更感到通过联合化解相互间仇杀的必要性。一位德国记者曾写道:“战争损伤了欧洲大陆的经济,使欧洲各民族,不管是胜者还是负者,都处于受两个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大国的奴役的危险处境……只要欧洲还分成碎块和充满仇恨,只要它的经济还躺在废墟上,只要贸易的通道继续被堵塞着,欧洲各民族就缺少健康生存的手段。”德国著名作家海因利希·曼等人也主张通过德法合作达到欧洲的团结。一位曾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青年文学家则在其政治论著中指出,法国无论人口、物产,都不能与德国相比。欧洲作为欧亚大陆上政治、经济支离破碎的一个小半岛,与俄美等国相比,只有结成联邦才有前途^[12](第 191-195 页)。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联邦的思想除了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之中继续流行外,已经开始为一些政治家,特别是法德两国的重要政治家们所接受。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无法在两国间缔造真正的和平,只有相互合作和信任才能使两国人民永远享受和平的阳光。

曾经多次出任法国总理和外长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就是法德合作和“欧洲联邦”计划的最热心鼓吹者之一^[14](P. 2)。这位法国政治家建立欧洲联邦的努力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实现法德和解是欧洲联邦的基础。作为一位著名政治家,白里安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法德关系是整个欧洲国际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因此,他从 20 世纪初开始就一直“坚决主张法国和德国和解”^[15](第 93 页)。为了达到与德国的和解,他甚至不顾许多法国人的反对,支持德国于 1926 年成为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并明确宣布:“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制,要和平!”此后,他又在图瓦里协议中向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作出重大让步: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等,以换取德国的信任和合作。白里安的和解政策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就表示,德法两国间的这种和解政策已经成了“欧洲和平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而 1923 年以后长期指导英国对外政策的奥斯汀·张伯伦也以局外人的眼光指出:白里安和施特莱斯曼“正努力在被鲜血染红的过去的废墟上建立和平的神殿”^[15](第 93-95 页)。然而,白里安的法德接近政策终因法国众议院中反对派的强烈反对而失败。

在无法直接实现法德接近政策的情况下,白里安又采取“曲线”政策,试图通过建立一种集体安全体系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他借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0 周年之际给美国人民写了一封信,建议两国互相保证不把战争作为政治手段。这一建议得到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的响应。1928 年 8 月 27 日,美、法、英、德、比、意等 15 国在巴黎签署了著名的“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根据这一条约,各方一致谴责以战争解决国际纠纷,废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处理争端和冲突时只能用和平方法解决^[16](第 558-560 页)。白里安将非战公约的签订当做实现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一个里程碑,并因此称签订该条约的一天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第一天”。

白里安和平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欧洲联合。非战公约则为实现欧洲联合提供了可能性。1929 年 9 月 5 日,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十届大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又提出了建立联邦性质的欧洲的思想。他指出:“我认为像欧洲这样在地理上聚居在一起的各个民族之间应该保持一种联邦关系;这些国家的民族随时都要进行接触,讨论他们的利益,做出共同的决议,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能够共同对付。我要努力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15](第 146 页)1930 年,白里安在受国际联盟委托起草的一份关于欧洲联盟的备忘录中,进一步设想将欧洲联盟建成一个拥有欧洲会议、常设政治委员会和秘书处在内的独立机构。他甚至提出了通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来加强欧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促进各国间商品、资本和人员流通的计划。然而,英、德、意等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一设

想。此后,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升温 and 法国国内白里安政敌的胜利,白里安的欧洲联盟计划也不了了之。

对白里安等法国政治家的和解和合作倡议,以施特莱斯曼为代表的德国一些重要政治家也作出了热烈响应。在签署洛迦诺公约的演说中,施特莱斯曼明确表示,真诚地感谢白里安关于“所有民族间,特别是那些在过去遭受巨大灾难的民族间需要合作”的说法,支持关于每个人既是本民族一员又是欧洲一员的“欧洲思想”,并宣布,“我们不能在冲突和相互敌视之中生活,我们必须携手共同努力”^[17](P. 101-102)。施特莱斯曼甚至表示,“法德间存在的分歧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互信任的新时代”。他还表示,他和白里安同样在长期不懈地“追求法德理解的政策”^[17](P. 106)。当白里安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倡议时,已经病得很重的德国外长仍发表演说,表示非常赞成这一计划。德国另一位政治家,时任科隆市市长和普鲁士国家议会议长的康拉德·阿登纳则以一种务实的眼光提出了实现法德等国经济联合的主张,目的在于为法德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打下“一种稳固的、长久的基础”^[18](P. 274)。

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了在欧洲框架内实现法德和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寻求和解的过程中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一直较为主动,战败的德国则处于被动响应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关于欧洲联合的讨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实现欧洲联合,欧洲才能从战争中摆脱出来。战争初期,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曾提出了按照法西斯政治和经济观念来统一欧洲的所谓“新秩序”,即在政治上强制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经济上实行以德国为中心的“一体化”和“专业化”,社会和文化方面则推行“日耳曼化”。这种奴役性的“新秩序”显然不是欧洲人民所向往的真正欧洲联合,因此也不可能实现。与纳粹主张相反,法国政治家雷内·迈尔等在 1943 年提出的欧洲国家经济联邦的思想和戴高乐的联合斯拉夫人、日耳曼人、高卢人和罗曼语族人建立起欧洲的和平和安全的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欧洲联合的走向。同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明确地提出了战后要建立“欧洲议会”的具体目标^[14](P. 2-3)。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关欧洲联合的想法再次浮出水面。当时推动欧洲联合的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次世界大战使作为主战场的西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断下降,西欧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被美国所取代。以工业生产为例,1913 年,西欧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 50%,到 20 世纪 50 年代,其工业产值已下降到世界总产量的 1/4 多一点^[19](P. 16-17)。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欧各国只有停止内耗,走联合共强的道路,才能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第二,二战后的西欧成了东西方冷战对抗的最前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苏联的西进威胁,保障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第三,人们期望通过欧洲一体化来彻底解决德国问题,防止德国在复仇主义情绪下重新走上战争之路。当时法国资深政治家勃鲁姆说得很清楚,“在一个和平和稳定的欧洲中使德国不致为害”的惟一途径就是把德国结合到一个“强大的、足以对它进行再教育和加以约束的,并在必要时加以控制的国际共同体之中”^[20](第 336 页)。换言之,只有通过欧洲联合,建立一种超国家的一体化机制,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行为加以限制,才能实现欧洲的长久和平和相互合作。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方面是法德和解以及欧洲联合的积极主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阿登纳为代表的联邦德国政府则成了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的最积极提倡者。

阿登纳政府之所以在法德和解和欧洲联合方面表现出特别积极主动的态度,是由战后联邦德国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其一,摆脱战败国的阴影,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和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其二,结束德国的分裂,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其三,须抵御苏联西进的威胁,保证自身的安全。正是针对以上几大任务,战后的阿登纳政府将德法和解、欧洲一体化、加入西方军事联盟体系等列入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目标^[21](P. 90)。所有这些政策归纳起来就是“选择西方”^[22](序)。

在阿登纳政府以上对外政策的努力中,欧洲一体化是其最核心的内容。第一,只有实行欧洲联合,才

能使欧洲各国摆脱“民族主义”的“幽灵”,恢复相互间的信任,扫除各国特别是法国对曾经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成见,从而为德国的政治复兴扫清道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阿登纳一再强调:德国人须抛弃“民族绝对主义”和“那些由于民族思想和民族传统造成的障碍”。他指出:“在今日的欧洲,世仇完全不合时宜了……一位联邦总理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德国人和好的欧洲人。”^[23](第 203 页)

第二,实行西欧联合是实现德意志民族重新统一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只有实现欧洲联合,才能消除人们对于德国重新统一的恐惧和阻挠;另一方面,在当时冷战形势下,阿登纳政府认为,仅凭联邦德国自身的力量难以迫使苏联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让步,只有在欧洲联合和取得美国坚定支持的情况下,联邦德国才有统一德国的强大实力后盾。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指出:“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而要在自由中实现德国统一,这是谁也不能自圆其说的。”当时的法国人也看透了阿登纳政府的用意:“对德国人而言,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意义在于,为夺回德国的东部地区获得一个战争伙伴。”^[24](P. 326)

第三,实现西欧联合有利于联邦德国改善自己的国际地位,保证自身的安全。一方面,在欧洲一体化之下,联邦德国不仅可以取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而且可以打破战后对联邦德国主权的种种限制,使之作为平等的一员参加欧洲一体化事业,可以“以欧洲一体化和西方联盟的名义,而不是以名誉扫地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名义来提出其政治上和法律上平等的要求”^[25](第 40 页)。而且一体化将使德法两个主要西欧国家的利益置于共同基础上,从而有利于消除法国的疑虑,减轻法国对联邦德国平等权利的恢复的阻挠。正因为如此,阿登纳曾明言,“只有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上我们与法国关系的长期安宁才有可能”^[26](P. 132)。另一方面,在东西方冷战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一个联合的西欧也是联邦德国对付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威胁的强大依靠。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联邦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对各项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计划和倡议给予大力支持。

然而,联邦德国政府很清楚,无论是德国政治地位的改善和恢复,还是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推行,诸如结束对鲁尔区的控制,萨尔问题的解决和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等等,主要取决于法国的态度。因此,阿登纳明确提出要“一直把始终不渝地争取和法国建成友好睦邻关系看成是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必须不顾一切困难、挫折和失望坚持这个目标。法德之间如不建立友好关系,欧洲的联合是难以想象的。跟法国取得谅解乃是西方团结的基本前提。”“法德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就是任何一种欧洲联合的核心内容”。有鉴于此,在 1949 年 11 月 3 日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阿登纳明确表示: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将成为其“政策的核心点”^[27](P. 164)。

出于以上想法,阿登纳政府在上台初期就接二连三地提出了促使德法两国和解的各种建议。1950 年 3 月在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阿登纳建议:法国和德国应完全一体化,首先从关税联盟和关税议会开始,就像 19 世纪初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一样,并以此“作为欧洲合众国的基础”^[27](S. 165)^[18](P. 274)。而且当时的人们也普遍认为,经济一体化必将导致欧洲共同体,就像德意志关税同盟导致德国的统一一样^[21](P. 95)。但是,阿登纳知道,作为战败国,联邦德国的任何建议在当时都只能起一种舆论作用,提出欧洲联合方案的真正主动权在法国人手中。

法国政府对德政策的转变为德法和解和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对德政策是建立在戴高乐制定的严惩、肢解德国和鲁尔地区国际化的政策基础上的。然而,到 50 年代初,随着冷战的加剧,法国政府的对德仇怨政策日益失去存在的基础。首先,美英两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强烈要求扶持联邦德国。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显然难以阻止其邻国的复兴。加上阿登纳政府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以及对法国的多次和解表示,法国已经无理再坚持原有强硬立场。法国政府于是决定变被动为主动,顺应时势,通过欧洲一体化途径将联邦德国纳入共同的利益之中,使之在未来不至于再次危害欧洲。同时,法国认为,欧洲联合将加强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法国在一体化欧洲中的主导作用也必将有利于其大国地位的恢复。

法国政府遂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欧洲联合的计划。1950 年 5 日,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在美国的支

持下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法国提出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通过煤钢等重工业领域的联合经营,“取消民族状态的重工业”,使法德之间建立起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并以此“服务于两民族的和解”,避免两国间发生新的战争^[28](P. 20)。法国方面关于煤钢联营的舒曼计划出台后,阿登纳立即作出了热烈反应:“舒曼计划完全与我提到的关于欧洲重要工业一体化的思想相适应。我立即通知罗伯特·舒曼,我衷心接受他的建议。”^[27](P. 165)。1951年4月,法、德、意、卢、比、荷6国签订《欧洲煤钢联营条约》,1957年3月,6国外长又签订包括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在内的《罗马条约》,将联营计划扩展到其他经济部门,从而使有关国家在统一的市场下紧密地绑在一起。

“一个能起作用的欧洲只有由同等权利的国家构建而成”^[28](P. 21-22)。经济一体化使联邦德国在经济发展方面逐渐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其政治地位的恢复却是通过重新武装来实现的。阿登纳政府也将重新武装看成是联邦德国恢复充分主权的标志,因为只有拥有正常武装力量的国家才谈得上真正拥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冷战的加剧、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加强欧洲国际地位的需要等,使得原本强烈反对武装联邦德国的法国政府的态度趋于软化。1950年,美国为增强北约实力,提出了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为此,法国于1950年10月提出建立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军的普利文计划,希图通过建立欧洲军队来阻止德国建立自己的军队。1951年2月谈判舒曼计划的过程中,法国方面开始允诺德国在欧洲共同防务中将“像其他自由国家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28](P. 27)。这意味着法国政府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态度开始转向。1954年10月,美、英、法、德等国签订《巴黎协定》,确认联邦德国的主权,联邦德国以“平等成员国”资格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至此,联邦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都与西欧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西方世界平等的一员和“坚定的一部分”^[29](P. 187)。欧洲的合作创造了“必要的互信基础”^[28](P. 21),法德两个民族终于在欧洲一体化的框架内走到了一起。这是两个民族在经历了千年的相互仇杀后作出的一项正确抉择。

综上所述可见,化解德法两国间的长期不和与实现欧洲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推动欧洲联合的主要因素。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则是相互争斗不休的德法两国取得和解的惟一可选择道路。

注 释:

- ① 有关德国历史的开端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英国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公元843年为德国建国的开始。而德国史学家通常将10世纪初作为德国历史的开端。

参 考 文 献

- [1]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M]. Mannheim, 1986.
- [2]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M]. München, 1985.
- [3] 英 詹姆斯·布赖斯. 神圣罗马帝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4] 美 帕尔默,科尔顿. 近现代世界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5] 苏 波将金. 外交史:第1卷(上)[M]. 北京:三联书店,1979.
- [6] 法 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7]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M]. München, 1983.
- [8]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上册[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 [9] Reif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M]. New York, 1973.
- [10]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11]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12] 陈乐民.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 [13]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Wolfgang Harbrecht.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M]. Stuttgart, 1984.
- [15] 法 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 外交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16]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Z].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 [17] Felix Hirsch. Gustav Stresemann 1878/1978[M]. Bonn, 1978.
- [18] Raymond Poidevin. Die unruhige Grossmacht 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 Jahrhundert[M]. Freiburg/Wuerzburg, 1985.
- [19] Walter Hallstein.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M]. Düsseldorf/Wien, 1979.
- [20] 萧汉森, 黄正柏. 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21] Franz Herre. Deutsche Europapolitik zwischen Integration und nationalen Interesse[A]. In Helmut Reuther (Hg), Deutschlands Aussenpolitik seit 1955[C]. Stuttgart, 1965.
- [22] Ludolf Herbst. Option für den West: Vom Marshallplan bis zum deutsch-französischen Vertrag[M]. München, 1989.
- [23] 吴友法, 邢来顺, 等. 当代德国[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24] Peter Koch. Konrad Adenauer——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M]. Hamburg, 1985.
- [25] W. 汉时德, G. 奥顿. 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 [26] Werner Bihler. Die Adenauer Ära: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9–1963[M]. München, 1993.
- [27] Hanrieder/Rühle(Hg). Im Spannungsfeld der Weltpolitik: 30 Jahr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1949–1979)[M]. Stuttgart, 1981.
- [28] Ernst Majonica. Deutsche Aussenpolitik: Probleme und Entscheidung[M]. Stuttgart, 1965.
- [29] Jürgen Heideking/Gerhard Hufnagel/Franz Knipping. Wege in die Zeitgeschichte[C]. Berlin, New York, 198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Franco-German Relations & Uniting of Europ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XING Lai-s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NG Lai-shun(196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majoring in European History and German History.

Abstract The frequent wars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brought since the medieval era great suffering to the people of France and Germany and even Europe. Therefore, some people began to look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French and German by the uniting of Europe. In the first half of 1950s Germany and France became reconciled in the fram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a word, to realize the reconciliation of Germany and French was the main factor that the people promoted the uniting of Europ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the only way for the reconciliation of Germany and France.

Key words Franco-German relations; reconciliation of France and Germany; uniting of Europe